



文

——1985年后中国小说的一种读法

谢有顺◎著

学的路标

文

学的路标

——1985年后中国小说的一种读法

谢有顺◎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路标：1985年后中国小说的一种读法/谢有顺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11

(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

ISBN 978-7-218-06555-7

I. 文… II. 谢…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3947号

策 划	金炳亮 钟永宁
责任编辑	余正平 李翊昕
整体设计	张竹媛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印 刷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360千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8-06555-7
定 价	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83780120 83790604】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林 雄

副主任：顾作义 廖红球

委 员：孙丽生 廖 琪 张建渝 吴佳联 郑广宁

金炳亮 温远辉

主 编：廖红球

副主编：孙丽生 廖 琪 张建渝 吴佳联 郑广宁

金炳亮 温远辉

编 辑：范英妍 李艾云 展 锋 严瑞昌 易小淬

钟永宁 谢海宁 余正平 黄丹宁 陈 宁

春华秋实 岁月如歌

——《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序

林 雄

新中国迎来60华诞！

60年，波澜壮阔，江山如此多娇。在党的领导下，华夏儿女谱写了最壮丽的甲子华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现广阔前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地处南疆的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实验田，这片热土翻天覆地的辉煌成就，恰是我们的国家沧桑巨变的一个精彩缩影。在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新形势下，南粤人民正以科学发展的新业绩向共和国生日献礼。

60年，百花齐放，风景这边独好。经由两千年深厚底蕴的岭南文化滋养，岭南文学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紧贴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民族进步，以大量优秀的作品生动展示新中国奋斗历程和宝贵经验，热情讴歌党和人民伟大实践的丰功伟绩，充分反映南粤人民精神面貌发生的可喜变化，为现代化建设事业勾勒出生动的发展图景，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岭南文学的繁荣壮大，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煌煌宝库。

在隆重、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中，广东省作家协会组织编辑出版《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一套31部作品，给人民共和国奉献上一束小花，以表达广大文学工作者拳拳爱国之心。

这是岭南文学成果的一次展示。丛书收入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较具影响力或代表性的作品，当中有《三家巷》、《花城》、《香飘四季》、《月夜》、《风雨太平洋》（第一部）、《山乡风云录》、《风雨年华》、《虾球传》等脍炙人口的名家名作，有《大风起兮》、《天堂众生录》、《围龙》、《商界》、《苍天厚土》、《大江沉重》、《终结于2005》、《中国式燃烧》、《秋露危城》（《白门柳》第二部）、《依然是你》等备受好评的精品佳作，有《南中国碣石玄武山》、《瞬间与永恒》、《落草集》、《高原苦旅》、《成长1984》、《血脉的回想》等散文、诗歌，有《庄世平传》、《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守护生命》等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也有《中西比较文艺学》、

《想象中的时间》、《心灵的见证》、《文学的路标》——1985年后中国小说的一种说法等文学理论、文学评论。这些作品或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洞悉社会万象的本质，或以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树立思想道德的楷模，或以民族的优良传统指引价值的取向和行为的准则，积极传递高尚的情感境界、健康的人生追求、美好的艺术情趣，真正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拓展了岭南文化的内涵。

这也是岭南文学队伍的一次检阅。入选丛书的作家，既有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享誉国内文坛的名家大家，也有在改革开放31年间取得不凡成绩的优秀作家。他们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主动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积极适应人民群众审美情趣、欣赏习惯的深刻变化，大力推进文学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创新，实现题材体裁、风格手法的极大丰富，展现出了务实、开放、兼容、进取的作家风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抗击“非典”疫魔期间，33名作家奔赴医务第一线采写作品，充分表现出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情深。多年来文学创作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也激发了岭南文学创作的生机和活力，创作主体的构成形成了层次多、覆盖面广的局面，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文学作品源源涌现。

60年，激扬文字，春华秋实。《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的推出，恰逢其时。在作品征集、推荐筛选、审阅整理等环节程序上，省作协尽力做到科学周密、严谨细致，尽可能把读者公认、反响良好、最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推选出来。丛书的编辑出版，获得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重视，得到全省广大作家以及部分已故作家的亲属之大力支持。广东人民出版社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积极宣传岭南文学，如期顺利出版丛书，可喜可贺！正所谓“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31部代表性作品，基本上能够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岭南文学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各个时期取得的可喜成就。

60年，弹指一挥，岁月如歌。继往开来，壮丽的事业呼唤优秀的作品，伟大的时代造就杰出的作家。改革的时代，变革的社会，发达的科技，火热的生活，仍将为文学创作提供广阔舞台和丰厚土壤。东方风来满眼春，期望我们的作家继续当好人民心声的代言人和时代进步的记录者，阔步迈向欣欣向荣的文学前程。

2009年8月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前言

不过是几年时间，文学批评便已沦为文学界的贱民。不断有人站出来宣告，文学批评正在走向终结，或者文学批评已死；批评家自身的心态，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严重的扭曲，加上文学语境的深刻变化，学术制度对文学批评的挤压，今天，要理性地谈论文学批评的现状和未来，已变得越来越困难。然而，即便文学批评的衰败是这一文体必然的命运，如何重建批评的精神和批评的伦理，也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只是，对批评困境的真实探讨，正在被一些外在的话语迷雾所遮蔽。公众对文学批评的不满，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的互相指责，作家谈论起批评家时那种轻蔑的口吻，媒体不断夸张批评家的一些言论，关于人情批评，等等——这些症候，正在被总结为文学批评日益堕落或失语的标志，仿佛只要解决了以上问题，批评就能重获生命力和影响力。但我觉得，关于批评，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值得探讨，那就是批评主体的贫乏。“我在当今的批评实践中，看到的最大的病症是——批评已经越发的沦为无心的写作。即便越过那些过度泛滥的会议式评论，我们依然可以在许多批评文章中，看到虚假、僵化、冷酷、腐朽的写作品质。批评也是写作，一种有生命和感悟的写作，然而，更多的人，却把它变成了一门死的学问或审判的武器，里面除了空洞的学术词语的堆砌和貌似庄严实则可疑的价值判断，并没有多少属于批评家自己的个人发现和精神洞察力。没有智慧，没有心声，甚至连话语方式都是陈旧而苍白的，这样的写作，

如何能够唤起作家和读者对它的信任？”^① 批评主体的空洞和退场，才是造成批评日益庸俗和无能的根本原因。可这些年来，文学界在讨论问题时，总是习惯把责任推诿给时代，似乎处于一个罪恶的时代，才导致了一种文学罪恶的诞生。但作家自己呢？批评家自己呢？如果在他们的内心能站立起一种有力量的价值，并能向公众展示他们雄浑的存在，时代的潮流又算得了什么？人情和利益又算得了什么？说到底，还是主体的孱弱、贫乏、自甘沉沦，才导致了写作和批评的日渐萎靡。

因此，批评主体的自我重建，是批评能否走出歧途的重点所在。批评也是一种心灵的事业，它挖掘人类精神的内面，同时也关切生命丰富的情状和道德反省的勇气；真正的批评，是用一种生命体会另一种生命，用一个灵魂倾听另一个灵魂。假如抽离了灵魂的现场，批评只是一种知识生产或概念演绎，只是从批评对象中随意取证以完成对某种理论的膜拜，那它的死亡也就不值得同情了。批评家李静说：

文学批评，这种致力于理解人类精神内在性的工作，随着“精神内在性”的枯竭而面临着空前的荒芜。人们看起来已不需要内在的精神生活，不需要文学，因此，更不需要文学批评。^②

她说出了问题的关键。表层意义上的批评喧嚣，不能掩饰它在“理解人类精神内在性的工作”上的静默。无法进入人类精神的内面，它所映照出的，是批评自身已经失去了内在的维度——思想，理性，美学抱负，灵魂的冒险，等等。我愿意在批评主体的构成上，找寻近年来批评溃败的真实原因。

我首先想指出的是，当下的批评家普遍失去了文学的信念。“信念”是一个旧词，它像灵魂一样，成了这个时代的隐私。确实，在今日的中国，谈论身体、欲望，甚至裸照，都已不再是什么秘密，唯独谈论灵魂和理想，却成了真正的隐私。为何有那么多批评家愿意加入商业和政治的合唱？为何那些貌似道德的批评家在道德上却溃败得更快、更令人触目惊心？为何平庸的作品会被歌唱，寂寞的作家却一再被忽视？除了明显的审美无能，另一个原因就是批评信念的丧失。批评的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判断一部作品的好坏？为了表演文学分析的技艺？为了通过对话向作家示好？无论哪一种解释，似乎都可对应于一部分批评。但这远不是文学批评的全部。一种有创造力和解释力的批评，其实是在分享作家的想象力，并阐明文学作为一个生命世界所潜藏的秘

① 谢有顺：《对人心和智慧的警觉——论李静的写作，兼谈一种批评伦理》，载《南方文坛》2006年5期。

② 李静：《当此时代，批评何为？》，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8期。

密，最终，它是为了说出批评家个人的真理。这种“个人的真理”，在我看来，就是批评的内在精神，它是“批评也是一种写作”的最好证词。

既然批评也是一种写作，这种写作就一定会呈现心灵的图像。批评家的心灵图像，就是批评的信念之所在。所以，那些庸俗的批评，言不及义的批评，有意夸大和拔高的批评，隐藏着利益诉求的批评，就不仅是一种语言的失控、审美的无能，它还是批评人格的破产。这样的人格破产，即便在一些批评家貌似庄严的言辞下面，也能清晰地看出来。今天，从事批评的人越来越少，只要活跃在批评现场的人，对每一个人的批评面貌都不会陌生，就那么几本刊物，就那么些文章，就那点或隐或显的人际关系，无论是人的品质还是文的品质，可以说都无处藏身。因此，辨析一种批评人格的真实状况，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把每个人的文字找出来一读，他的用心，他的着力点，就都一目了然了。曾经有一个博士生在和我探讨批评伦理这一话题时，习惯性地沿用一些批评家的道德言辞来审视当下的文学现状，他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悲哀的、不满的，我劝他不要急于下结论，而是照着他所引用的这个批评标准，对当下比较活跃的一二十个批评家近年的文章作一个统计和分析，分析结果一出来，他突然发现，那些看起来最具批判锋芒的人，写的人情文章往往篇数最多，吹捧起庸俗作品来也往往最不吝啬形容词——那个博士生坦言被自己的这一发现吓得“目瞪口呆”。而我并不觉得稀奇。以文学混世界的人从来就有，以批评来审讯作家也成了一件常事，纠缠于这些外在的乱象，对于看清文学和批评的未来并无助益。尤其是批评的衰败，最终的原因，并非批评家被这些渺小的利益所诱惑而不能自持这么简单，它的症结还是在批评信念的丧失。英国女作家维吉妮亚·伍尔芙曾说：“我们同时代的作家们所以使我们感到苦恼，乃是因为他们不再坚持信念。”这令我想起王阳明的另一句话，“持志如心痛”。

确实，信念和志向的溃败，使批评家放弃了批评本应有的高度，也不再把批评的写作当成是一种心灵的自我追问，更不把批评的原则和生命的原则对等起来。批评成了一种技术分析，成了贿赂良心的一种话语方式。批评话语在泛滥，批评人格却在萎缩。批评不再表达个体的真理，而是成了权力话语的附庸——这个权力话语，既可能是意识形态指令，也可能是消费主义潮流。何以批评人格会如此脆弱？何以审美和心灵的防线如此不堪一击？利益固然是一个核心因素，但我们也不能藐视批评人格的构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思想饥饿。回想文学批评兴盛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应该承认，那时的文学批评是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同时，批评家也普遍是锐利而勇敢的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无论是哲学的，还是社会学的，或者是叙事与艺术的，几乎都被文学批评家们所率先使用和实践。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可以轻易想起南帆和符号学、陈晓明与后现代主义、吴亮与叙事学、朱大可与西方神学、戴锦华与女性主义……之间的联系。以这种联系，对照于今日的批

评界，就会发现，批评主体明显表现出了一种思想的贫乏。

思想的贫乏，导致个体的真理无从建立。我读现在许多批评家的文字，强烈地感觉到了他们在知识谱系上的陈旧气息，同时，也发现几乎整整一代人都缺乏思想。尤其是新兴起的批评家，几乎不读哲学，更无法获得一种哲学性的理解能力，这成了他们致命的局限。事实上，不仅批评界如此，小说界、诗歌界也是如此。好的小说家和诗人，都是有自己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的人。这种世界观、艺术观从何而来？只能从思想和哲学中来。缺乏思想，藐视哲学，作为个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会大受损伤。没有思想，对小说家和诗人而言，就没有发现人性和创造世界的武器；对批评家而言，就没有对艺术世界的解释力。个体的真理，以创造力和解释力为表征，以思想为根基。思想资源的贫乏、单一，就意味着切断了作家和批评家的精神来源。何以批评界人云亦云的文字越来越多？就在于批评家的解释能力匮乏，面对作品所呈现的世界，也没有思想穿透力，他只能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一些人批评家的眼光的犹疑，往往是精神独立性、思想穿透力严重匮乏的表现。

有了批评信念，才会向往一种思想高度，才会看重个体真理的建立和精神的独立表达。因此，如果要探究文学批评的困局，重申信念、思想、精神独立性这样一些批评的核心品质，就显得异常重要。所谓“先立其大”，这就是文学批评的“大”，是大问题、大方向。让文学批评成为个体真理的见证，让文学批评获得解释生命世界的能力，让文学批评能建立起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并能以哲学的眼光理解和感悟存在的秘密，让文学批评家成为对话者、思想家，参与文学世界的建构、分享人类命运的密码，这或许是重建批评精神和批评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也就是说，要让批评主体——批评家——重新成为一个有内在经验的人，一个“致力于理解人类精神内在性的工作”的人。批评主体如果无法在信念中行动，无法重铸生命的理解力和思想的解释力，一些人所热衷谈论的批评道德，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批评不是战场，不是简单地比谁更勇敢，谁更大胆，应该看到，批评还是一种专业，是专业，就有专业的尊严和专业的难度。可是，如何理解批评的伦理，文学界一度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不少人理想中的批评主体，应该是战士、批评家、良心的检查者或审判官，但除此之外，专业精神和专业知识是不是也不能忽略？只是，在一个以愤激为主要话语特征，以横扫一切为勇敢标志的年代，冷静地谈论专业精神和审美能力，反而会被人看做是精神软弱的表现。刻薄人事，刻薄文学，早已成为一种风潮，这些话语作风，也必然会影响文学批评的写作。相比之下，下面这种言辞便体现出不多见的警觉：

基于个体精神自由的哲学意识，文学批评应致力于对创造行为的理解

和发现，而非从自身理论方法出发，对阅读对象进行随心所欲的“取证”与“审判”。

“审讯式批评”恐怕是中西文学批评的通病。因此，郭宏安先生在勾勒马塞尔·莱蒙的批评实践时，强调“体验”是莱蒙最根本的方法，他反对以审讯者的姿态、通过一种有成见的阅读来控制 and 俯视对象，反对将作者和作品作为刻板的真理之证明来对待。他认为文学作品不是物质材料，而是一个生命，“应该试着与它生活在一起，在自己身上体验它，但是要符合它的本性。”因此文学批评“是一种体验的结果，是一种试图完成作品的结果，说得更明确些，是一种在其独特的真实上、在其人性的花朵上、在其神秘之上的诗。”这部诗篇建立在对作品的精神、细节、语言、节奏、风格特性的体验和捕捉之上，但它的终点并非像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那样，只是为了“科学地”认知作品的“艺术形式”，而是为了说出对文学艺术的哲学的理解，切中与生命现实息息相关的精神要害。^①

如果文学作品不是物质材料，而是一个生命，那么，文学批评也应该是一种对生命的觉悟。进入一个生命世界，就不仅有判断，也要有体验，不仅有褒贬，也要有同情和理解。也就是说，一种批评人格的构成，既要有判断的智慧和勇气，也要有专业精神和审美直觉。创造力和批判精神，是批评写作的主要品格，废弃任何一方，最后都会因为精神失衡而使批评失色。那么，应该如何平衡批判与创造之间的关系呢？这令我想起蒂博代关于批评的阐释，他把批评分为“寻美的批评”和“求疵的批评”两种。蒂博代的批评观念显然具有更多的“寻美的批评”的色彩。他并不否认“求疵的批评”的意义，但对这种批评究竟有多大的好处却深表怀疑。他认为，“求疵的批评”是把评论作为创造力的作品当成了批改学生的作文，然而作家不是学生，作品也不是学生的作业，前者是创造，是天性的流露，而后者只是重复或模仿，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出来的。因此，“批评的高层次的功能不是批改学生的作业，而是抛弃毫无价值的作品，理解杰作，理解其自由的创造冲动所蕴含的有朝气的、新颖的东西”。“求疵的批评”恰恰是忽视了作家身上的天性这一极其重要的因素，抱着好为人师的态度在作品上任意批改。这样的“合作者”显然是过于“粗暴”了，其有益性大可讨论。^②而对比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可以发现，“寻美的批评”显得太少了，现在引起文学界注意的多半是“求疵的批评”——裁判的冲动显然压过了创造的激情。特别是近年来制度化的学术话语被过度尊崇，使得

① 李静：《当此时代，批评何为？》，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8期。

② 参见郭宏安：《读〈批评生理学〉——代译本序》，见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郭宏安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7页。

文学批评中生机勃勃的个人趣味和生命感悟遭到蔑视，“职业的批评”最终成了没有热情的说教或知识演绎，或者是没有判断带来的审美迟疑，或者是过度判断带来的精神暴力。二者都不是理想的批评精神。

由“寻美的批评”和“求疵的批评”的区分，我们很容易联想起李健吾的批评风格。李健吾认为，批评本身“也是一种艺术”，而最好的批评是既不溢美，也不苛责，“不诽谤，不攻讦，不应征”^①；维护批评尊严，不以贬低写作者的地位为代价，批评者和写作者之间应该是平等的，而批评者更应是谦逊的，要与写作者取对话的态度。“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批评家，李健吾始终用自己的心去感知体会，用温柔敦厚的语言来表达。即便是批评的意见，也无丝毫疾言厉色，而是真诚地抒发委婉地表达，宽则以厚地给出公允的评论。”^②李健吾要年轻人都记住考勒几的忠告：“就其缺点来评判任何事物都是不明智的，首先的努力应是去发现事物的优点。”——“去发现事物的优点”，即为寻美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实践，显然更具建设性和创造性。只是，如今的舆论和文学情势，似乎不断地在要求批评家成为战士，似乎唯有批判和战斗，才能体现一个批评家的价值和良心。很清楚，这是公众对一种批评现状普遍表示失望之后的吁求，可以理解。可作为批评者，我们自己怎么看？当我们在发力批判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想一想何为谦逊？当我们以勇士面目示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意识到和作家对话的必要性？一旦自己以为真理在握，会不会因为缺乏敬畏和宽恕，而使自己变得狭窄、变得斤斤计较？为此，我更喜欢像李静这样的批评家，她也批判，但她的文字并不孤冷，而是同时兼具一种润泽人心的智慧和力量：

她的批判虽然尖锐、直接，但并不走向道德暴力，也不露出一个苛责者的冷酷面容。任何时候，她都是一个谦逊的对话者。她深刻，但不狭窄；她执着，但不疾言厉色；她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显扬自己真理在握，而是为了发现问题，逃离困境。她在说出不同的文学意见时，并不失其赤子之心；她的批判力度再大，都不会激怒任何人，她是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温润，揭示和探索文学新的可能性——她从不相信，文学就是现成的模样，也不相信那些成就卓著的作家，已经走到了可能性的尽头。李静的文学世界里，还有高远的理想，她自己也说，不满的精神是文学的灵魂，而在文学的不满的精神之上，居住着一个我们永远无法对之完整认知的绝对存在。这个存在，在我看来，既有智慧的品质，又有顽童的情怀，惟其如此，这个绝对存在和庶民之间，才有来往的精神通道。王船山说庶民是

① 李健吾：《咀华二集·跋》，见《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孙晶：《李健吾与〈咀华集〉〈咀华二集〉》，载《小说评论》2006年第2期。

“至愚”，又是“至神”，就是这个意思。^①

我还想起李长之。他有很多论到文艺批评的文章，其中，长文《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②，最有系统性。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一个批评家要完成对一部作品的批评，首先要有理解力，其次要有褒贬，再次要提出正面主张。如何理解作品？批评家要有哲学的头脑，要跳入作者的世界，要了解作者的环境和社会；如何定褒贬？不能追求客观，要带着感情，而这种感情呢，不是作者的个人私见，而是深入到作品世界中后的审美能力，敢于肯定，也敢于否定；最后，要提出正面主张，要明确自己张扬怎样一种文学精神。

——在李长之的批评文字里，有勇敢的批判，更有极富创见的审美分析，且后者更为他自己所看重。所以，他强调专业精神，认为批评家所需要的学识有三种：一是基本知识，如语言学、文艺史学，越巩固越好；二是专门知识，如美学或叫诗学，越深入越好；三是辅助知识，如生物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社会科学等，这些知识越广博越好。^③ 勇气、智慧和学识的结合，或可视为理想中的文学批评的基本构成，为此，我一直期许出现一种有力量的批评，它有智慧和学识，还有优美的表达。只是，由于批评主体思想单薄，批评情绪偏于愤激，批评语言枯燥乏味，现在的批评普遍失去了和生命、智慧遇合的可能性，而日益变得表浅、轻浮，没有精神的内在性，没有分享人类命运的野心，没有创造一种语言风范的自觉性，批评这一文学贱民的身份自然也就难以被改变。因此，重申信念、思想、哲学眼光、专业精神、审美能力，是为了让文学批评的主体从一种精神和信念中站立起来，以专业精神重塑批评的专业品格，从而赢得批评本应有的专业尊严。在这个过程中，光有胆识和勇敢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提出正面主张，张扬一种建设性的创造精神。就此而言，以下三点，或许是今后的文学批评写作急需注意的问题：

一、克服审美的无能。在文学批评中，我认为专业的良知高于道德的良知。以专业的态度，指出作品中的艺术得失，这就是一个批评家的专业良知；而在批评文字中对作家的人格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以“利己的打算”极尽攻击之能事，这看起来是一种道德的批评，其实恰恰是最不道德的——因为他丧失了一个批评家起码的专业精神。因此，无知有时比失德更可怕。对一部作品没有起码的鉴赏能力，在一部作品面前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明显的审美瘫痪，这

① 谢有顺：《对人心和智慧的警觉——论李静的写作，兼谈一种批评伦理》，载《南方文坛》2006年5期。

② 李长之：《李长之书评》（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③ 李长之：《论文艺批评家所需要之学识》，收入《李长之书评》（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才是批评家的耻辱，这样的批评文章，即便有着再庄严的道德字眼，也难以赢得别人的尊敬。要重新确立审美在文学批评中的核心地位。

二、警惕一种话语狂躁症。这些年来，刻薄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很多，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作家、批评家的灵魂视野存在着很大的残缺。要知道，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隐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样的批评很难在精神上说服人。因为没有整全的历史感，不懂得以宽广的眼界看世界，批评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褊狭、执拗甚至狂躁，难有温润之心。这令我想起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①。钱穆所提倡的对历史要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这既是他的自况之语，也是他研究历史的一片苦心。文学批评的写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三、要学习肯定文学的常道。中国人讲文学，一直有两条路，一条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条是从道德的角度看。重历史、轻道德，结果就是迷信变化，无从肯定。每一次文学革命，都花样翻新，但缺少一种大肯定来统摄作家的心志。文学有历史，当然也有道德，不过，文学的道德，不简单类同于俗世的道德而已。文学的道德，是出于对生命、心灵所作出的大肯定，是对一种文化理想的回应。我现在能明白，何以古人推崇“先读经，后读史”——“经”是常道，是不变的价值；“史”是变道，代表生活的变数。不建立起常道意义上的生命意识、价值精神，一个人的立身、写作就无肯定可言。所谓肯定，就是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常道，还有不变的精神，吾道一以贯之，天地可变，道不变。没有常道的人生，就会失了信念和底线；没有常道的文学，也不过是一些材料和形式而已。因此，现在谈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枝节上的争执已经毫无意义，作家和批评家所需要的，是生命上的大翻转，是价值的重新确立，是道德心灵的复活，是灵魂受苦之后的落实。肯定文学的常道，提出正面的主张，这是文学的大体，识此大体，则小节的争议，大可以搁置一边。只有敢于肯定的批评家，他才会创造力在想象力和想象力面前谦卑，才会有一个宽广的胸襟、以公正的眼光观察世界，解析作品，并最终说出个人的真理，深度分享文学和精神的内在经验。

^①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

目录

前言 / 001

第一章 小说及其叙事者 / 001

第二章 失重的现实 / 053

第三章 想象历史的方法 / 135

第四章 文学先锋 / 183

第五章 身体、俗世与灵魂 / 229

代后记 文学叛徒今何在? / 277

第一章

小说及其叙事者

一、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

1. 叙事革命的停顿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揭晓，贾平凹的《秦腔》位列获奖作品榜首。我发现在评审讨论过程中，关于《秦腔》的争议，还是像它刚出版时一样，多集中在故事好看不好看这个问题上。熟悉新时期文学的人都知道，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小说的叙事革命才是文学的主潮，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讲故事。因此，那时即便是不讲故事，甚至反故事的小说，依然能获得文学界的高度评价——许多先锋小说，正是在这个背景里受到重视的。但是，十几年之后，当《秦腔》面世，小说好读不好读，再一次成了尖锐的问题被提出来，这种阅读趣味的变化，透出的是怎样一种文学转型？

阅读《秦腔》确实是需要耐心的，它人物众多，叙事细密，但不像《废都》、《高老庄》那样，有一条明晰的故事线索，《秦腔》“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

的泼烦日子”^①。在叙事上,《秦腔》是一个大胆的探索。四十几万字的篇幅,放弃故事主线,转而用不乏琐碎的细节、对话和场面来结构整部小说,用汤汤水水的生活流的呈现来仿写一种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这对读者来说,是一种考验,对作家而言,也是一种艺术的冒险。在当代中国,像《秦腔》这种反“宏大叙事”、张扬日常生活精神的作品,并不多见。因此,要真正理解《秦腔》,就得把它当作一部探索性的小说来读,一味追求故事是否好看的人,必然难以接受这种细密、琐碎、日常化的写法。米兰·昆德拉在论到卡夫卡的小说时所说:“要理解卡夫卡的小说,只有一种方法。像读小说那样地读它们。不要在 K 这个人物身上寻找作者的画像,不要在 K 的话语中寻找神秘的信息代码,相反,认认真真地追随人物的行为举止,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思想,想象他们在眼前的模样。”^② 如果,真能“像读小说那样”读《秦腔》,就会发现,《秦腔》写的是当下中国的“废乡”景象,而贾平凹对乡土中国变迁的精细刻写,以及对这种变迁的沉痛忧思,的确把握住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乱象。

“像读小说那样地读它们”，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读小说就是为了读故事？故事与叙事是不同的，叙事才更接近小说的本质。正如托马斯·曼所说，小说家既要通晓现实，也要通晓魔力。故事所描述的是一种现实，而叙事则是一种语言的魔力。应该说，从先锋小说发起叙事革命开始，小说写作就不仅是再现经验，讲述故事，它还是一种形式的建构，语言的创造。写作再也不是简单地讲故事了，它必须学会面对整个二十世纪的叙事遗产——只有建构起了自己的叙事方式的作家，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可是，这个经过多年探索所形成的写作难度上的共识，开始被文学界悄悄地遗忘。更多的人，只是躺在现成的叙事成果里享受别人的探索所留下的碎片，或者回到传统的叙事道路上来；故事在重新获得小说的核心地位的同时，叙事革命也面临着停顿。

这种停顿，表明艺术惰性在生长，写作和阅读耐心在日渐丧失。讲述一个有趣而好看的故事，成了多数作家潜在的写作愿望——今天的小说家几乎都成了故事的奴隶。我在想，文学一旦丧失了语言冒险的乐趣，只单纯地去满足读者对趣味的追逐，它还是真正的文学吗？说到底，文学的独特价值，许多时候正是体现在语言的冒险上——语言的冒险，叙事的探索，往往能开辟出一条回归文学自性的道路。当初，马原的“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这一经典句式对当代小说叙事的重大启示，不正是因为马原找到了一种新的语言方式么？离开了这一点，写作的意义就值得怀疑。可是，在这样一个喧嚣、躁动的时代，有谁愿意去做那些寂寞的叙事探索？故事要好看，场面要壮大，经验要公众

① 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页。

② 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